

王连儒 著

汉魏六朝琅琊王氏家族 政治与婚姻文化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王连儒 著

汉魏六朝琅琊王氏家族 政治与婚姻文化研究



羲之遠宦帖

少子之少大
治之之少大
多之之少大
多之之少大
多之之少大
多之之少大
多之之少大
多之之少大
多之之少大
多之之少大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魏六朝琅琊王氏家族政治与婚姻文化研究 / 王连儒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11

ISBN 978 - 7 - 5161 - 3496 - 2

I. ①汉… II. ①王… III. ①家族 - 政治文化 - 研究 - 中国 - 汉代—魏晋南北朝时代②家族 - 婚姻 - 文化 - 研究 - 中国 - 汉代—魏晋南北朝时代
IV. ①D6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52145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曲弘梅
责任校对 何又光
责任印制 李 建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版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7
插 页 2
字 数 512 千字
定 价 6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家族政治与婚姻文化研究，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是学术界热衷探索研究的课题；因为自古以来，大凡那些在不同历史时期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家族，均对其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乃至文化等产生重要影响。由于中国古代国家政治的族群化和姓氏区分，加之家族存在对朝廷政治带来的影响，故政治的家族化以及族群政治的倾向性，往往成为左右国家政治存续走向的重要因素。中国自春秋战国始，无论国家政治的构成还是参政群体的质性，几乎都与家族以及家族政治的存在密切关联；姓氏婚姻，兄弟、甥舅之国，成为这一时期关系到国家政治存在发展的重要因素。“春秋”时期诸侯宗姓与婚姻所包含的伦常政治及文化关系，在《左传》一书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左传》所记从鲁隐公至哀公十二君，共二百五十余年的历史，其宗姓与伦常婚姻关系几乎成为诸侯间政治与文化交往的主要依据。因此，研究这一时期诸侯的宗姓婚姻与政治文化关系，不仅可以借此了解“春秋”时期与宗姓婚姻有关的伦常政治现象，而且对我们研究以封建宗法制为主体的封建社会的兴衰变迁，同样也会起到积极的作用。据不完全统计，《左传》所涉诸侯封国多达七十四个，涉及的姓氏也有近二十个之多。在所有七十四个封国中，姬姓封国多达四十二个，占有封国的56.8%。其次是姜姓，占8.1%，嬴姓占5.4%。姬、姜等姓氏封国结成的伦常政治网络，故又形成这一时期许多所谓的“兄弟之国”；由于诸侯间错综复杂的婚媾关系，加之异姓诸侯间的婚姻联属，国家形态中往往又呈现出许多“甥舅之国”的现象。在宗姓认同与婚姻归属基础上所形成的诸侯结盟，几乎使“春秋”时期所有诸侯封国均处于宗姓与婚姻认同的不同位置与层面，从而在政治、军事、外交以及文化交往中产生影响。实际的情况是，这种因宗姓和婚姻所形成的相互牵制，并没有完全使诸侯间形成一种相对和谐与稳定的政治军事盟体，相反，在宗姓与婚姻的影响下却出现了连年不断的领土争端与政治军事纷争。这说明，宗姓认同与婚姻联属不仅不可能完全制约政治，而且诸侯间的政治军事关系也常常因宗姓或婚姻关系而陷入困境。秦汉及魏晋六朝

以来的情况也不例外，虽然自秦以后国家不再处于宗姓分割与诸侯分立的状态，但宗姓家族却仍然是国家政治的主体，以血缘宗姓为主的家族仍然是整个国家机器的核心与轴心。秦始皇建立统一强大的国家后，对整个国家行政体制的改革可以说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然而仅仅十几年的时间，强大秦帝国的大厦便随着农民起义的浪潮轰然倒塌。有人在总结秦朝灭亡的原因时曾将其失却以往对同姓诸侯的分封作为缘由，实际上，这样的判断也并非绝无道理。在封建宗法制社会，国家政治的支撑基本上取决于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作为封建政治主体的皇族及其支系，二是参与朝廷政治的其他家族群体，二者之关系构成了封建政治体制是否牢固的基础。西汉王朝建立后，刘邦手下的大臣曾向其建议恢复秦以来所废除的分封同姓诸侯的制度，如此才有了西汉一朝分封同姓诸侯多达八百人的情况。虽然“家天下”的政治理念在汉代也曾遭到一些正直且富革新精神士人的反对，虽然在此背景下自汉、晋以来也出现过诸如“吴楚七国反”和“八王之乱”这样一些源自于家族内部的政治矛盾与纷争，但分封制始终还是成为封建政治体制得以长期存在延续的基础。在封建社会，皇权政治和士族权力的此消彼长，往往成为影响朝廷政治稳定与否的关键，而魏晋六朝以来琅琊王氏在朝廷政治中的存在，也从不同方面印证了这一点。

见诸史载较早的琅琊王氏成员是西汉昭帝始元二年（前85）参政的王吉。王吉少学明经，以郡吏举孝廉为郎，景帝时担任昌邑王中尉，曾因廉正直谏而著称。汉宣帝时，王吉出任博士谏议大夫，曾因犯颜直谏而被宣帝称之为“其言迂阔”。魏晋之际，王吉之后人王祥、王览，在政治以及家学等方面秉承家族传统，使这个有“累世之美”的家族得以在朝廷政治和民间评鉴中得到认可。王祥的“忠孝”不仅属于家族的荣耀，更为魏晋易代之际司马氏提倡的所谓“以孝治国”的方略所认同。其后，王祥五子在朝廷政治中虽然并没有大的作为，但其同父异母弟王览所延续的宗族庞大支系，却成为琅琊王氏真正意义上家族政治和道德人格的传继者。魏晋以来，琅琊王氏参与朝廷政治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主要历史阶段：一是魏晋易代之际王祥对其家族政治的建立所发挥的作用，这是琅琊王氏被朝廷认同、世人接纳的时期，琅琊王氏作为朝廷政治中有影响的宗族势力，开始为世人所关注。二是西晋“永嘉之乱”前后以王廙、王敦、王导、王衍等为主导的策划晋室东迁、辅佐司马睿登基的事件，这应该被看作是琅琊王氏掺入并主导朝廷政治的开始。故东晋王朝建立后，琅琊王氏主导并左右朝廷政治长达数十年之久，成为当时最具影响力的士族群体。三是王敦之乱给琅琊王氏在政治上所带来的信誉危机，这是琅琊王氏政治人格受到朝廷猜忌，权力、权益遭遇其他士族群体诘难怀疑的最为艰难的时期。四是晋穆帝以后，随着颍川庾氏、陈郡谢氏和谯郡桓氏的政治崛起，

琅琊王氏政治呈现出逐渐衰颓的趋势，其家族成员须依附强权势力才能发挥政治作用，世家大族的政治光环悄然退去。五是刘宋王朝建立后，门阀士族政治虽然不再是左右朝廷政治的主导力量，但琅琊王氏后人凭借其祖宗荫庇，仍旧得到皇室之认同并在朝廷政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琅琊王氏的政治轨迹，不仅反映了其家族内部的政治变化，重要的是也映射出不同朝代朝廷政治的更替兴衰，家族政治兴衰成为朝廷政治变化的晴雨表。

二

在中国古代，封建政治体制的建立与运作均带有浓厚的政治伦常色彩，这不仅因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观念为人们接受认可，而且很多人也希望将其阐释为一种带有普遍性的治国理家的理念加以推行。就皇室而言，选妃立后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婚姻问题，而是关乎家国政治的稳定与实施；中国历史上的外戚干政并不罕见，如此便导致了皇室在此问题上的小心审慎。魏晋以来，士族把与皇室的婚姻看作是重要的事情，这样不仅可以借助于婚姻攀附皇室，而且也可在政治上有更多升迁的机会和宗族惠及，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用在这里也不无道理。尚主的情况与选妃相比则有所不同，公主下嫁对于对方来讲虽然仍不失为一种荣耀，但公主特殊的身份以及由此养成的性情，往往使对方心有顾忌。据不完全统计，琅琊王氏自西晋时起便有选妃尚主的经历，自此以后，其家族历经宋、齐、梁、陈四朝，选妃尚主的人数在诸多士族群体中一直处于领先。皇室所选女子一旦步入妃后行列，在伦常政治权益上均有与帝王同等甚或超出帝王权力的可能。若遇主幼时艰，被选者一旦成为摄政妃后，那么外戚势力自然会对朝廷政治产生重要影响，所谓“自古受命帝王及继体守文之君，非独内德茂也，盖亦有外戚之助焉”^①，似乎也说明了这方面的问题。历史上琅琊王氏虽然也有人成为妃后，但史书中却没有将其家族的相关人员列入《外戚传》，原因无非是她们并没有因主幼时艰秉持朝政的经历。

东晋从元帝至恭帝共十一帝，一百零六年，见诸《晋书·后妃传》的妃后有十六人，在这十六位妃后中，琅琊王氏只有安僖王皇后一人。安僖王皇后名神爱，王献之女，晋孝武帝太元二十一年（396）被立为太子妃，安帝即位后立为皇后。王神爱被立为皇后的时间距琅琊王氏政治鼎盛的元帝、明帝、成帝三朝已有数十年之久，这说明琅琊王氏政治鼎盛时朝廷的妃后选立，其家族并不占优势。除王献之女王神爱以太子妃身份入宫后被安帝立为皇后外，西、

^①（汉）班固：《汉书》卷九十七《外戚》（上），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933页。

东晋见诸史载的琅琊王氏成员尚主者共三人，分别是王敦尚武帝女襄城公主，王献之选尚简文帝女新安公主，王羲之尚孝武帝女鄱阳公主。除此之外，王徽之娶刘义融女为妻，刘义融父道怜，是刘宋高祖刘裕的中弟，其人在朝廷政治中具有较大影响。王徽之为献之弟，生年不详，卒于晋孝武帝太元十三年（388），虽然其娶刘义融女时距刘宋建立尚有时日，但仍可视作是与帝室通婚之一例。

刘裕建宋后，其用人政策发生了明显变化，东晋以来形成的士族政治体制逐步弱化解体。虽然如此，作为膏粱盛德，犹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故像琅琊王氏家族及其后人，在刘宋以后的历代朝廷政治中，仍然备受世人关注。据不完全统计，由晋入宋，琅琊王氏在《宋书》中单独立传或间接见诸他人传记的有三十余人，这说明，此时的琅琊王氏虽不像两晋那样在政治上具有统挟帝室的影响，但其参政人数却未见减少。在婚姻方面，琅琊王氏与帝室通婚的比例显著增加，尚主或被纳妃的人数在其他见诸刘宋历史的士族群体中占有明显优势。在琅琊王氏与帝室的婚姻中，有二人立后，分别是孝武文穆王皇后和明恭王皇后，占宋帝立后总人数的12.5%，尚主以及娶宗室诸王女为妻者七人，与其他士族立后、尚主人数相比明显偏多。这些名门之后之所以在婚姻领域为帝室认可接受，除去血缘宗姓的优势外，家族政治的影响也不容忽视。从琅琊王氏尚主及被纳妃的人数看，刘宋一朝占有绝对优势，共计十二人次之多，这个数字甚至超过齐、梁、陈三朝尚主纳妃十人的总数。究其原因，晋、宋易代要远比齐、梁、陈三朝更替时的社会政治环境更复杂，加之以往士族群体对朝廷政治的影响，故晋、宋之际的这些士族后裔，也便受到易代君主的特别重视。新朝政权希望通过强化与士族后裔的婚姻乃至政治关系，进而起到稳定朝廷政治的作用；而这些士族后人，往往也可通过与皇室的婚姻，获得其政治上应有的权益，从而不仅能够朝廷政治中保有充分的话语权，同时也可延续和维护其家族及门第的肃整和尊严。齐、梁、陈三朝的情况似乎有所不同，一是除梁以外，其余两朝的国祚相对短暂，皇室依托士族后裔或通过与其建立婚姻关系维系政权稳定的意识逐渐淡薄，加之士族群体对朝廷政治影响力的减弱，故以往皇室热衷于与士族通婚的情况也随之发生变化；二是就这些士族后裔而言，前朝因与皇室婚姻经历的是非坎坷使其不再对通过婚姻攀结帝室感兴趣，彼此间虽看待问题的角度不同，但目的却一致，这大概也是琅琊王氏刘宋一朝与皇室婚姻多于齐、梁、陈三朝的原因。

除去士族对皇室婚姻的攀附外，士族间的婚姻关系也表现出明显的政治协同或彼此牵制的倾向，比如说“王与马共天下”中所臚杂的婚姻关系，王、谢婚姻离异中体现出的政治矛盾，王、郗婚姻中的政治协同与分歧等等。据

《晋书》卷五十九《东海王越传》记载：“初，元帝镇建邺，裴妃之意也，帝深德之，以第三子冲奉越后。”又据《晋书》卷六《元帝纪》记载：“永嘉初，（元帝）用王导之计，始镇建邺……”由此可见，元帝渡江镇守建邺，裴妃与王导发挥了重要作用。东海王司马越所纳裴妃，出自河东闻喜裴氏，父康，祖楷，皆知名当世。西晋时裴、王二族齐名，《晋书》卷三十五《裴秀传》有“时人以为八裴方八王”的记载。王衍与东海王司马越虽无婚姻关系，但却可以通过裴妃等人对其施加影响。王衍有三女，一为愍怀太子妃，一嫁贾充之孙贾谧，三适河东裴遐。裴遐是东海王司马越妃裴氏的从兄，因此，王衍完全可以通过裴妃沟通与东海王司马越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善言玄理，音辞清畅，冷然若琴瑟”^①的裴遐，与东海王司马越也保持着良好的交往，他曾被司马越引为主簿，这些关系对促成司马睿渡江镇守建邺，均能发挥一定的作用。王、谢婚姻矛盾的形成主要围绕着桓温逆代一事展开，焦点是抑制桓温逆代的谢安和拥戴桓温政治的王珣、王珣兄弟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不仅最终导致谢安与王珣兄弟的婚姻离异，同时也为后来王珣与桓玄携手裁抑谢氏埋下伏笔。琅琊王氏与高平郗氏本来自王导时起便有着很好的政治协作，其婚姻矛盾由王导从孙王献之与郗昙女离婚而引发。《晋书》卷八十《王羲之传》附《献之传》记王献之疾笃时，“家人为上章，道家法应首过，问其有何得失。对曰：‘不觉余事，惟忆与郗家离婚。’献之前妻，郗昙女也”。除王献之娶郗昙女外，其父王羲之娶郗鉴女，昙是郗鉴次子，这样，郗、王二族实为姑表联姻。同样的事情《晋书》卷六十七《郗鉴传》也有记载：“王献之兄弟，自超未亡，见愔，常蹑履问讯，甚修舅甥之礼。及超死，见愔慢怠，屣而候之，命席便迁延辞避。愔每慨然曰：‘使嘉宾不死，鼠子敢尔邪！’”这里问题的关键有两点：一是王献之为何与郗家离婚，临终前忆及此事为何又幡然悔悟；二是王献之兄弟为什么在郗超生时敬重郗愔，而郗超死后却常违舅甥之礼呢？实际上，王、郗二族的婚姻隔膜，此前便早已显露出来，《世说新语》“贤媛第十九”所记王右军夫人郗睿对其二弟愔、昙所说的王家重谢氏而轻郗氏的话，已向我们透露了这方面的信息。郗超字嘉宾，郗愔长子，超与桓温关系过从甚密，政治上堪称桓温死党。桓温当政，郗超权倾一时，甚至连谢安、王坦之等人候见都心怀忐忑，故王献之因郗超权势敬重郗氏也是常理。至于郗超死后王献之怠慢郗氏诸人，这其中的原因是否和琅琊王氏对桓温乱政的不满有关系。因此，士族间的婚姻关系有时因政治协同而牢固稳定，有时又因政治分歧而衅仇离散。

^①（唐）房玄龄等：《晋书》卷三十五《裴秀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052页。

三

汉魏以来，大凡那些在政治上有重大影响的士族群体，往往文化上也有着悠久的承传历史，琅琊王氏自王吉以来所践行的学术参政、文化兴家的传统，成为其家族文化存续发展的重要标识。世人崇尚道德学问，而朝廷旌扬表彰的恰恰也是这方面的典型，琅琊王氏可以凭借其淳厚的道德与渊博的学问入世，而朝廷则可借此作为推行其政治统治的典范在朝廷政治中加以推广，并以此作为强化政治统治的手段。就学术而言，王吉、王骏父子在当时均有较大的影响。“初，吉兼通五经，能为邹氏《春秋》，以《诗》、《论语》教授，好梁丘贺《说易》，令子骏受焉。”^①有关王骏受梁氏《说易》的情况，《汉书》卷八十八《梁丘贺传》也有记载。

贺以筮有应，由是近幸，为太中大夫，给事中，至少府。为人小心周密，上信重之。年老终官。传子临，亦入说，为黄门郎。甘露中，奉使问诸儒于石渠。临学精熟，专行京房法。琅琊王吉通五经，闻临说，善之。时宣帝选高才郎十人从临讲，吉乃使其子郎中骏上书从临受《易》。临代五鹿充宗君孟为少府，骏御史大夫，自有传。

梁丘贺为琅琊诸人，与王吉同乡，此人“以能心计”而著称，其所传《说易》，又以占筮应征闻名，故其《说易》所推明者，也绝非是与自身政治命运无关的所谓朝廷大事，也就是说，梁丘贺《说易》，不仅带有明显推演朝廷政治的目的，更具鲜明的政治投机色彩，是此时“经术之士”热衷探究的问题。鉴于此，王骏师从梁丘临受《说易》，不仅适应了当时学术政治的需要，对学术实用性的推崇，更反映出王吉使王骏受梁氏《说易》的真正目的。王吉本人以研治《春秋》、《诗》、《论语》闻名，同时对梁氏《说易》也颇感兴趣，说明其在学术方面，有着广泛的爱好与追求。学术思想关乎政治理念，这一点从王吉的政治经历中已经看得比较清楚，因此，王吉、王骏父子追求学术实用的路子，符合当时朝廷政治的需要。仕于魏文帝黄初元年（220）的王祥，虽然相关史书中没有其治学的记载，但其政治人格与王吉却有许多相似之处。王吉至王祥虽然有六代之久，但史家为王祥立传，仍然不忘提及其为汉末谏议大夫王吉之后这样一个事实。在王祥身上，我们似乎又看到其先人“经明行修，显以励俗”的政治品质与人格魅力，可以说，前人对王吉忠孝廉正

^①（汉）班固：《汉书》卷七十二《王吉传》，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066页

的评价，在王祥这里表现的同样明显。

在玄学盛行的魏晋，琅琊王氏既有像王戎、王衍那样的尸禄耽崇、不亲庶务的清谈领袖；也有像王导等人那样致力于政治作为的儒玄兼宗者。当然，王导并非是一位古板的政治家，《世说新语》中记载了许多王导涉言清谈的事例，玄学家的机锋和敏锐，在王导身上同样也体现的非常充分。《世说新语》“文学第四”载：“旧云，王丞相过江左，止道《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三理而已，然宛转关生，无所不入。”以上玄学家的论题，王导能深入细致、婉转道来，可见其玄学家的素养和水平还是相当高的。又“文学第二十二”条：“殷中军为庾公长史，下都，王丞相为之集，桓公、王长史、王蓝田、谢镇西并在。丞相自起解帐带麈尾，语殷曰：‘身今日当与君共谈析理。’既共清言，遂达三更。丞相与殷共相往反，其余诸贤，略无所关。既彼我相尽，丞相乃叹曰：‘向来语，乃竟未知理源所归，至于辞喻不相负。正始之音，正当尔耳！’明旦，桓宣武语人曰：‘昨夜听殷、王清言甚佳，仁祖亦不寂寞，我亦时复造心，顾看两王掾，辄罢如生母狗馨。’”阮放家贫，王导曾因其为名士与庾亮常供给衣食。阮放为阮修子，而阮修又为王导族叔著名清谈家王衍所敬重。“王衍当时谈宗，自以论《易》略尽，然有所未了，研之终莫悟，每云‘不知比没当见能通之者不’。衍族子敦谓衍曰：‘阮宣子可与言。’衍曰：‘吾亦闻之，但未知其亹亹之处定何如耳！’及与修谈，言寡而旨畅，衍乃叹服焉。”^①实际上，琅琊王氏中的许多人，只是将清谈作为点缀其政治生活的手段，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其名士、名臣兼综的人格，才能真正在士流中有讲话的资本。顾和所说王导“明公作辅，宁使网漏吞舟，何缘采听风闻，以察察为政”^②的话，连王导本人听后也“咨嗟称善”^③。做官风流洒脱，为政不拘细节，遇事不以察察为准，行政无为而无所不为，这实际上与道家思想有许多相通之处。王导虽不像其他玄学名士那样身为宰辅而不以庶务樱心，但却可借助于玄学家的理念去佐治朝政，因此，在王导身上，既有玄学家虚放的一面，同时又有儒家务实求真的成分。

魏晋时期，一个在政治上有影响的家族如果没有其族群本身的文化系统与传承，那将是很很难想象的事情。王祥族孙王戎，“正始”时期“竹林七贤”的重要成员，很难预想，王祥这样的人在王戎眼中同样也具备清谈家的资质。

①（唐）房玄龄等：《晋书》卷四十九《阮籍传》附《阮修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366页。

② 同上书，卷八十三《顾和传》，第2164页。

③ 同上。

“祥之薨，奔赴者非朝廷之贤，则亲亲故吏而已，门无杂吊之宾。族孙戎叹曰：‘太保可谓清达矣！’又称：‘祥在正始，不在能言之流。及与之言，理致清远，将非以德掩其言乎！’”^①王戎话的意思是，王祥本来具备清谈家的素养，但由于其德高位显，故以德掩言，清谈家鼓吹的那些有损于其官德身份的话，王祥有时是有意回避的。也许在王祥看来，合适的时候，涉言清谈并无不妥，这大概也是王戎所说“太保可谓清达矣”、“及与之言，理致清远”的真正意思。王戎评价王祥的话，多少也反映出像琅琊王氏这样在道德与政治上有影响的士族，在世风学术迁变中的审慎选择。王戎、王衍是魏晋时期的清谈领袖，像这种带有鲜明时代印记，在当时以及后世引起广泛争议的学术现象，琅琊王氏中的许多人无疑成为世人关注甚至诟病的焦点。当然，魏晋清谈并非因王戎、王衍而起，这一时期特殊的学术政治生态孕育了其特有的文化现象，琅琊王氏中的某些人只不过是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已。

晋宋之际，礼乐制度得以重新整饬，魏晋以来的谈玄风气受到一定程度的裁抑。宋设雅乐，王韶之所作《歌辞》七首便并合施用^②，虽然此时文人士大夫尚且还沉浸于玄学及佛学的论辩之中，但在朝廷抑制虚浮世风的同时，大致也有了一个以儒学思想治理国家的基本标准。宋文帝元嘉初年，国学四科设立，儒学被单独列出，作为文人士大夫修研学术、佐治政治的参考，像这种情况魏晋以前未曾有过。宋初所立国学四科中，虽然琅琊王氏无人主持，但这并不说明琅琊王氏在此时的学术活动中就不是一个重要的群体，与此相反，自王吉、王祥等人以来所缔造的家学风尚，在这一时期却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使我们真正意识到琅琊王氏家学渊源在晋宋以来朝廷政治中发挥的作用。王弘是琅琊王氏由晋入宋后在朝廷政治中影响较大的人物，据《宋书》卷四十二《王弘传》记载：“弘明敏有思致，既以民望所宗，造次必存礼法，凡动止施为，及书翰仪体，后人皆依仿之，谓为王太保家法。虽历任蕃辅，不营财利，薨亡之后，家无余业……”宋太祖刘义隆对王弘等琅琊王氏成员盛德辅政的行为也大加赞赏，称王弘“清约之美，同规古人”^③。至于“王太保家法”以及刘义隆称赞王弘话的真正的含义是什么，我们通过以上记载可以知其大略。以上文字有四层意思：一是王弘的思想，明敏通变，为民望所宗；二是王弘的言行举止，必以礼法约束，造次彬彬有礼；三是王弘的书翰仪体，文宗当时，令时人仿效；四是王弘家无蓄财，以简朴传世，能够做到当官不营财利。实际上，

①（唐）房玄龄等：《晋书》卷三十三《王祥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990页。

②（梁）沈约：《宋书》卷十九《乐》（一），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541页。

③ 同上书，卷四十二《王弘传》，第1322页。

这些美德能够集于王弘一身，在当时实属不易。

王弘以后琅琊王氏中的王融、王俭也理应提及。王融对朝廷政治的建制，尤其是在有关少数民族政策等问题上提出的许多建议，显示了其政治家的才智与眼光。在当时，王融可以称得上是一位杰出的外交家，他曾先后与北魏使者房景高、宋弁等人接触交往，《南齐书》卷四十七《王融传》记载有其与高丽国外事活动的事情，在如何处理与边地少数民族关系问题上，王融提出“以夏化夷”的主张，如此既可免除干戈争战之苦，又可使汉家文化远被异方，是一项非常务实的外交策略。在朝廷礼制的制定与实施上，王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据《南齐书》卷九《志》第一“礼上”记载：“宋初因循改革，事系群儒，其前史所详，并不重述。永明二年，太子步兵校尉伏曼容表定礼乐。于是诏尚书令王俭制定新礼，立治礼乐学士及职局，置旧学四人，新学六人，正书令史各一人，干一人，秘书省差能书弟子二人。”在南齐，朝廷礼制的改革与重建大多与王俭有关，他参与了包括萧道成禅位在内的几乎所有朝廷仪规、制度的讨论和制定，在礼制建制方面具有较大的影响。王俭参政以学问见称于世，不与俗陋之事，是琅琊王氏中研治学问最博，对朝廷礼制建设贡献最大的人。“俭寡嗜欲，唯以经国为务，车服尘素，家无遗财。手笔典裁，为当时所重。”^①王俭曾上表求校坟籍，并依《七略》之制撰写《七志》四十卷，对综理典籍以及后世依此编著坟籍体例创造了条件。王俭撰写的涉及朝廷礼仪制度的文章颇为丰富，故当时朝廷的“礼仪诏策，皆出于俭”。^②“朝廷初基，制度草创，俭识旧事，问无不答。上叹曰：‘诗云：维岳降神，生甫及申。今亦天为我生俭也。’”^③王俭在朝廷礼乐制度建设方面的成就，令朝廷对其刮目相看。

在崇尚文艺的魏晋六朝，社会生活中的每一个环节，大到朝廷政治，小到文人士大夫日常生活，几乎都与文艺创作与传播有关。文人士大夫对文艺创作的喜好与兴趣，不仅催生了数量可观的文艺作品，而且作品的样式品类之多、之精，对当时以及后世文艺创作与发展产生的影响之大，均显现出这一时期文艺作品的价值，可以说，魏晋六朝是中国文化史上文艺创作空前繁盛的时期。在魏晋六朝文艺创作繁盛的背后，包括门阀士族群体及其家族成员在内的人对文艺的喜好与提倡，无疑又成为此一时期文艺繁荣发展的重要推动。沛国曹氏、吴郡陆氏、琅琊王氏、高平郗氏、陈郡谢氏、颍川庾氏、兰陵萧氏等等以

①（梁）萧子显：《南齐书》卷二十三《王俭传》，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38页。

② 同上书，第434页。

③ 同上书，第435页。

家族为主体、家族成员广泛参与的文艺创作，成为魏晋六朝文艺创作的重要力量。士族群体参与文艺活动，不仅有雄厚的政治基础和经济条件，而且还有其他人所无法企及的创作环境与氛围；而对于那些出身寒微却又渴望通过艺文接近士族步入政治的人来说，攀结依附士族权贵，融入其政治或文艺创作的圈子，无疑又是其显扬实现自我价值的重要途径，这也是在魏晋六朝之所以会出现所谓的“建安七子”、“贾谧二十四友”、“竟陵八友”等文人创作团体的重要原因。总之，这是一个被门阀士族统领的社会，不只是朝廷政治，也包含了文艺创作等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这些承载了政治和文化双重使命的士族群体及士人，对魏晋六朝政治的发展和文艺的繁荣，都带来了重要的影响。

琅琊王氏自西汉惠帝以来在朝廷政治上的存在与影响，在文艺领域的引领与成就，均符合这一时期士族政治存在和士族文艺创作的基本特征。琅琊王氏在文艺创作上的成就，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概括评述，一是学术研究的基本观念与价值取向，二是文学创作的艺术审美与追求，三是书法、绘画作品所形成的范式与影响，四是家族文艺观念形成的历史与渊源。由于以上四个问题在本书的相关章节已经涉及，故在此不再作详细分析。据不完全统计，汉魏六朝以来，琅琊王氏有诗作者四十二人，诗文总数三百七十余首（篇）；有集者四十九人，其家族成员无论是诗文创作的数量还是拥有文集的人数，在当时的士族群体中均占有一定优势。琅琊王氏王羲之、王献之等人的书法创作与成就不仅在当时无人企及超越，即使在今天仍然被广大书艺爱好者追崇模仿，成为琅琊王氏家族乃至中国传统书艺文化中永恒的瑰宝与标识。琅琊王氏书法作品入选《淳化阁帖》者有：王敦、王导、王恬、王洽、王劭、王珣、王珉、王廙、王邃、王羲之、王献之、王凝之、王涣之、王徽之、王操之等十五人。《淳化阁帖》又名《淳化秘阁》，是北宋太宗淳化三年（992）由宋太宗下旨，令翰林院侍读王著从宫廷内府秘阁所藏的历代名家书法中挑选出精品，镌刻在枣木板上拓印编辑而成。《淳化阁帖》是我国最早的书帖，共十卷，它汇集了宋以前历代帝王、名臣和书法家共一百多人的四百余篇作品。此《帖》行、草、楷、隶、篆皆有，钟繇、王羲之、王献之、柳公权等大家俱在，可以说，反映了宋以前历代书家的最高成就。

源于竟陵王萧子良，起自梁武帝萧衍围绕范缜《神灭论》所展开的讨论，是齐、梁时期有关佛教“有神论”与“无神论”问题的一次大的争论，也是佛教传入中国以来发生在宗教与世俗领域的一次最具政治色彩、最大规模或者说最富学术意义的讨论。琅琊王氏共有十一人参与了受梁武帝萧衍敕命，由释法云发起的对范缜《神灭论》的讨论，占整个参与人数的六分之一，他们分别是王融、王莹、王志、王揖、王泰、王缉、王柬、王彬、王斌、王琳、王

筠。王融虽未著论，但他却亲身经历了最初事件的发生和问题的集聚，他曾受竟陵王萧子良授意，劝说范缜放弃对“神灭论”的坚持，甚至以官俸相逼诱，迫使范缜让步。总之，汉魏六朝以来朝廷政治的风云兴废，琅琊王氏成员都曾经历，学术文化的发展迁变似乎又都曾参与，不仅在世俗政治，即使是在所谓的佛、道净界，也都有他们活动的轨迹。自汉昭帝以来至隋朝近七百余年的历史，作为有影响的士族群体，琅琊王氏几乎在历朝政治中都发挥过重要作用，这也是长期以来学术界研究关注这一家族群体的重要原因。

目 录

一 琅琊王氏宗系及职官述略	(1)
家族渊源与王雄支系	(1)
王吉支系中的王祥与王览分支	(3)
王览支系中的王裁一支	(6)
王裁子王导支系中的王珣、王珣兄弟	(10)
王览支系中的王正一支	(15)
二 琅琊、琅琊王氏与晋宗室诸琅琊王之关系	(22)
汉晋琅琊地域、郡制与户籍人口迁变	(22)
琅琊王氏与晋宗室诸琅琊王之关系	(30)
晋宗室诸琅琊王分封世袭综论	(38)
三 王吉与琅琊王氏政治之缘起	(51)
琅琊王氏家族政治门风的形成	(58)
王祥与魏晋政治之关系	(73)
四 “永嘉之乱”前后的琅琊王氏	(81)
琅琊王氏与魏晋政治格局	(81)
挟宗室之乱，立门户之威	(85)
王敦逆乱与琅琊王氏政治	(91)
五 士族分权与琅琊王氏政治之消长	(98)
士族分权及对王导“盛德政治”的抵制	(98)
桓温逆代与王、谢二族之矛盾	(102)
桓温逆乱与琅琊王氏之政治趋向	(105)

六	宋、齐、梁、陈与琅琊王氏政治之变迁	(111)
	晋、宋易代中的琅琊王氏政治	(111)
	废诛义帝与王、谢二族之矛盾	(115)
	宋、齐易代中的琅琊王氏成员	(119)
	宗族基业与梁、陈政治认同	(124)
七	琅琊王氏宗族门风及其政治品格	(128)
	忠孝治家、勤能并举的伦常政治传统	(128)
	王敦之乱与琅琊王氏之政治人格	(133)
	桓温逆乱与琅琊王氏政治之关系	(139)
	刘宋政治中的琅琊王氏成员	(144)
	王俭与宋、齐禅代	(153)
	志在绍兴家族政治基业的王融	(159)
	颇具政治野心、轻浅无防虑的王晏	(162)
	素无学术、以事干见处的王奂	(165)
	梁、陈政治与琅琊王氏之入世观念	(168)
八	琅琊王氏伦常婚姻与政治	(175)
	琅琊王氏与皇室婚姻关系综述	(177)
	“王与马共天下”中的婚姻伦常因素	(198)
	王、谢婚姻矛盾成因及其影响	(203)
	王、郗婚姻离异中的政治因素	(209)
	宋以来琅琊王氏婚姻关系之走向	(213)
九	琅琊王氏家学渊源与魏晋清谈	(221)
	家学渊源与汉晋礼乐制度	(221)
	王戎、王衍之清谈与世风及其人格	(233)
	谈风犹存、高调参政的王导与王敦	(242)
	王澄的放达与名士的自律	(250)
十	琅琊王氏书法传承及其艺术	(253)
	琅琊王氏书法创作及其师承源流	(254)

琅琊王氏书法作品的流传及真伪	(263)
琅琊王氏书法创作与理论	(277)
 十一 琅琊王氏及其文学创作	(299)
《兰亭序》及其诗	(300)
讽咏节序的诗	(304)
奉和赠答诗	(310)
咏物诗赋	(337)
征戍、爱情及游赏诗	(351)
佛、道及游仙诗	(366)
 十二 琅琊王氏与佛教及僧人之关系	(377)
琅琊王氏与僧人的交往	(377)
琅琊王氏与范缜《神灭论》	(401)
 琅琊王氏与六朝僧人交游一览表	(407)
 主要参考文献	(413)
 后记	(415)